



清太徐的热血传奇

牛丽荣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光普照大地，一支支活跃在清太徐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怀揣保家卫国的信念，在敌后战场书写了一段段令人振奋的热血传奇。

同戈站村夜炸敌机

1941年初冬的一个寒夜，山西清徐同戈站村外，武工队队长王立岗和队员王玉珍、王伟、韩天喜摸到停在那里的一架日军飞机下，紧握着手中的煤油瓶和棉花，几次尝试点火，都被肆虐的大风吹灭。

不远处敌人的枪声骤起，“用手榴弹！”王立岗压低声音喊道。王玉珍和韩天喜随即用手榴弹藏住敌人，王立岗、王伟数枚手榴弹同时飞向日军飞机。

几声巨响，火光冲破黑暗，日军飞机在烈焰中爆炸……

“我父亲常跟我讲起那个夜晚，他说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敌人的飞机再去伤害咱们的同胞……后来，老一辈人都管我父亲叫‘晋中平川的李向阳’，每次听到这话，我都觉得特别骄傲。”王立岗的儿子王洪轻抚父亲留下的勋章，眼神充满崇敬。

护送彭刘过境

1943年中秋节前夕，太行二分区接到上级命令，护送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通过敌占区，到延安参加中央会议。分区司令员曾绍山对王立岗说：“你们安全完成任务，记特等功，如果出了事，军法处置。”

黄昏时分，彭、刘等人在王立岗和周其德等同志掩护下，穿过了敌占区，通过同戈站据点，经过王答村进入龙家营、北云支村，到达汾河东岸的长头村渡口。晚上看守渡口的敌人撤回去睡觉，渡口上早有抗日骨干分子梁映堂等五名船工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尽管夏秋季节的汾河浪高水急，大家还是全部安全上岸。

天色已近黎明，前面就是太汾公路，也是太行到吕梁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王立岗先去侦察，确认没有敌情后，让大家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上固驿、猫儿梁前进，到了小峪寺稍事休息的时候，正巧遇到攻打草庄头的清太徐游击队四大队二中队。在二中队同志们的帮助下，王立岗几人终于把彭、刘等首长安全送进吕梁山区，顺利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

抗战时期，游击队在清太徐敌占区建立了几条地下交通线，安全护送过1000余名团以上干部、国际友人，以及2000余名新兵、爱国学生，为此受到中央的特别表彰，并奖励了一批武器装备。

智取南尹拔除据点

在清太徐地区，马乐清同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武工队长。1944年秋，日军在徐沟南尹村设下据点，驻扎了一个中队的伪军。这些伪军为非作歹，当地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9月2日晚，马乐清带领十余名队员从后窑出发，穿过太汾公路，到达南尹据点后，队伍分成两个班。一班由马乐清带领准备破门而入，另一路由刘计银带领打算攀梯翻墙。这时，一名队员不小心碰倒木棍，发出“哐当”一声轻响。哨兵察觉后，慌忙拉枪栓。情况危急，刘计银眼疾手快，猛扑上去将哨兵按倒在地，没等哨兵发出声响就将其制服。马乐清带领队员迅速冲上前，一脚踹开据点大门，包围了敌人的营房。

武工队一枪未发，俘虏了29名伪军，缴获31支步枪、2支手枪、一部电话机等物品。马乐清对俘虏进行了思想教育，不少伪军当场表示愿意参加八路军。

南安击毙日军顾问

1945年5月5日，带领武工队驻扎在柳湾村的马乐清获得情报：次日有敌人从孟封村返回清源城。他决定设伏，先令队伍白天向西行进以迷惑敌人，夜间则悄悄折返至敌人必经的南安村。

6日凌晨，队员们埋伏在南安汾河渡口村堰下。早饭过后，敌人先派六七人探路，顺利过河后，后续的警备队60余人放松警惕，开始脱鞋过河。马乐清见状下令攻击，子弹、手榴弹齐发，敌人乱作一团。一名日军军官（后知为清源日军顾问渡边龟）试图组织撤退，被队员刘计银击毙。

此战不到20分钟结束，打死敌人10余人、俘虏40余人，缴获手枪、指挥刀等物资。消息传开后，百姓编顺口溜称赞：“阴历三月二十五，顾问过河到乔武，八路军打了排子枪，顾问一命见阎王……”

如今，晋中平川早已恢复了和平与安宁，但清太徐抗日游击队的故事却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王立岗、马乐清……这些传奇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永远被后人铭记。



位于清徐县东于镇洛池渠村北的清太徐抗日民主政府旧址。（资料图片）



晋商的契约精神

米子川

公元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在内外交困和风雨飘摇之中寿终正寝。至此，明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执掌万历一朝的大船48年后，留下了最后一份年历，把明王朝搁置在经济崩溃、政治懈怠和人事混乱的浅滩上。

说起这位万历皇帝，也曾为晋商的发展带来一段重要的机遇。1572年，刚刚继位的万历皇帝只有10岁，首辅张居正在李皇后的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了文官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并启动民间力量对设置在北方的九边重镇进行粮秣供应和盐粮贸易的活动。正是这些钱粮生意盘活了山西商人的经商热情，很多晋商大贾从此开始发端。

也是在这一年前后，山西商人从明初开中制以来政府背景下的“运官粮换盐引”的贩运生意，开始逐渐大规模地拓展到池盐、手工业产品、煤炭、潞绸、茶叶、银钱等领域。当时及后世诸多历史典籍和文学名著，如《醒世恒言》《金瓶梅》《水浒传》《牡丹亭》等，都多次提到了产自山西长治的潞绸。这种丝绸生产和贸易业是在万历年间行銷全国，达到了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组织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丝绸生产户过千，缫丝的机器超过了9000张，年产潞绸估计在10万匹以上。潞绸花色丰富多彩，规格多样，质地精美，为明代时尚产业的发达推波助澜。后来，我们每次看到白先勇先生排练的青春版《牡丹亭》，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晋商大院的雍容气度和华服美食，其中就有精美潞绸的深刻印象。

说起盐引，在明朝初年的经济体制下，相当于为商人颁发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因为当时的盐是稀缺资源，实行国家专卖。商人通过转运政府和九边重镇所需的粮秣辎重，获得政府签发的盐引，再到盐业产区换取食盐，然后在指定区域销售获利，以补偿国家征用的款额。这种贸易活动的本质，就是利用国家许可权获得商业利益。史料显示，山西商人每年都能得到全部盐引的“十之三四至六七甚或八九”，也就是说，山西商人可以获得其中30%到90%的份额。这个市场份额，一方面得益于九边重镇的两个大镇，太原和大同均在山西境内，而且蔚州、延绥（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也相距不

远，因此山西商人获得了天然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擅长做生意的山西商人，在明王朝这项国策的驱动下，焕发了空前的热情，小买卖人合股搭伙，大生意家契约为盟，初具规模的商业活动已经遍布山西各地，许多大财东用契约的方式罗致人才，设立商号，分权分股，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意义上的契约制度和民间的契约传统。这些传统在晋商的经营和发展壮大过程中同样起着巨大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不仅秉持传统，而且符合晋商“信义为先，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从制度上保证了晋商长盛五百年，成为古代经济文化史上最强盛的一大商帮。

我国明代以前的商品买卖或市场经济活动的契约，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管理和社会意志，从而使契约成为官府行政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周代设司盟掌管契约活动，秦代更奉行“万物皆有法式”的思想，对契约的管制已臻完备。晋时“凡货买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文券即是当时官府税契背后有官印的契约。唐代改文券为市券，市券不仅盖有官印，还需官府审批，并制定了统一的市券格式。发展至宋代，出现了官版契纸和契尾。官版契纸由官府印制，税契用印，这样的契约才有效。明代也是这样，如崇祯年间，顺天府大兴县曾为清查税契银两而规定：“凡内监、勋戚、乡官、举监生员、军民人等，典卖房屋，设立官纸一张，眼同官牙，遵格开填，以凭交易，照例额数交纳税银。如有势豪阻抗，通同私牙代书白立契，及暗行私交者，定行指名参究治罪，法在必行，永为定例。”明清两代，除重视官版契纸的使用外，更重视契尾的作用，“止钤契纸，不连同契尾者”为违法。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契约控制是极其严密的。

但是，从明代以来，晋商契约制度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民间力量的道德约束和行业规范监督，不再依赖官府的法制化的契约监管。

第一，晋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从最初就使用了较为严格的契约制度。比如雇员入职时候的契约文书，除了聘用方、受聘方的签字画押外，还包括了推荐人、保证人的

字押。实际上就是把员工入职这样的内部事务，通过契约的形式上升到了社会层面，利用契约所无法表现的社会关系来保证雇员的忠诚和明示雇员的违约风险。

第二，合股入伙的商业契约，在晋商的经营管理中，比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契约制度，甚至现代企业制度，都更加完善和有着独特的人性魅力。

第三，契约精神是建筑在道德高度之上的，先由道德来约束商家的经营思想，再由社会规则来定义商家的经营底线，最后才是法制层面上的经济契约。

第四，晋商的很多契约实质上都会上升为一种社会契约，主要表现包括中人的介入、合约订立的方式，以及合约效力的无限溯及力等。晋商契约中的中人，就是借助保证人或担保人的个人信用和社会影响，来保证约定人的利益和行为约束，和今天的司法公证一样，有着极大的社会约束力。合同订立的地点、时间和方式，也是契约行为的一种社会化。东家每年召开的股东大会、经理人对账期间的述职、东家和掌柜的往来，等等，都表现了强烈的社会关系认同。乔致庸认为，为商，当以义为先，信随其后，利在其三。这也是明清以来晋商的共识，义利之间，舍利取义；信义之辨，先义后信。因为义代表公共关系，是社会约束和社会公德的表现，信则是个人声誉和商号商誉的表现，必须服从于更广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准则。在晚清晋商的经营活动，很多票号因为无力支撑，最后倒闭。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没有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有限责任”所导致的，商号经营不善或者竞争失利，东家必须无条件地承担无限责任，很多富商因此一夜之间致贫。虽然企业倒闭，但义利之间，舍利取义依然得到社会认同，在损失财富的同时，商人自身的道德感得以保全。这也是儒家传统中所谓“完人”的价值观。

回首五百年风雨沧桑，传承百十代的晋商契约，既是商贾之间的规矩，也是人性方圆的见证，如果没有朝代更替、战争、新兴产业的竞争，以及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晋商也会找到适应生产力变革、改善经营法度、重构商业价值观的良方。对于明清晋商来说，契约精神就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力量。

山西为何不叫河东省

王集

山西全境位于黄河以东，其命名为什么没有和位于黄河下游以北的河北省、位于黄河以南的河南省一样，叫河东省？

山西与“河东”一词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古时期。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尧舜禹三代的都城均位于今山西西南部：尧都平阳（今临汾尧都区）、舜都蒲坂（今运城永济市）、禹都安邑（今运城夏县西北）。这一区域因黄河呈东西走向，形成了“黄河以东、中条山以北”的封闭地形，故被称为“河东”。

“河东”成为行政区划名称则始于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今山西西南部设立河东郡，辖今运城、临汾一带。汉武帝时期，河东郡进一步发展为拱卫关中、连接中原的战略要地。唐代将河东郡升级为“河东道”，治所设在蒲州，这是“河东”首次成为一级行政区划。唐末五代时期，河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据有极重要地位，李克用、石敬瑭等割据势力均以此为根据地。

然而，“河东”作为行政区划，是一个相对于中原的方位名称，而非山西自身的主体性标识。

山西地名的最终确立，源于元朝行省制度的推行。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在全国推行“行中书省”制度，将行政区划从唐代的“道”升级为“省”。元朝将山西全境划为“河东山西道宣慰司”，这是“山西”首次与“河东”并列使用。明朝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在元朝基础上设立“山西等处行中书省”，正式以“山西”命名省级行政区。

“山西”名称的地理逻辑源于太行山的方位属

性。山西全境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山西”之名正是以太行山为参照物的方位命名。相较于“河东”这种以黄河为参照的命名，“山西”更符合元明时期“以山为界”的地理认知体系。朱棣1403年迁都北京后，太行山成为连接京师与中原的天然屏障，“山西”之名的方位属性进一步凸显其战略价值。

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和政治中心东迁，太行山的地理意义逐渐凸显：北宋定都开封后，太行山成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明清时期，北京成为政治中心，太行山进一步成为连接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关键节点。

现代山西的地理特征也强化了“山西”这一名称的合理性。山西全境被太行山、吕梁山夹峙，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2025年最新地理数据显示，山西东西宽约280公里，南北长约680公里，平均海拔1000米，是典型的山地高原地形。

“山围盆地”的地貌结构，使“山西”这一以山为界的命名比“河东”更具地理辨识度。此外，山西与河南、陕西接壤的黄河段仅占其西部边界的一小部分（主要集中在晋西南），以“河东”命名反而会模糊其主体性。

尽管“山西”成为官方名称，但“河东”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民间文化中，“河东”仍作为山西西南部的地域标识延续至今。例如，运城市盐湖区的解州镇，至今仍有“河东解良”的自称；唐代柳宗元被称作“柳河东”，明代蒲州人薛瑄亦以“河东学派”传世。这种文化记忆的延续，反映了“河东”作为历史核心区的文化沉淀。

“山西”名称的地理逻辑源于太行山的方位属

性。山西全境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山西”之名正是以太行山为参照物的方位命名。相较于“河东”这种以黄河为参照的命名，“山西”更符合元明时期“以山为界”的地理认知体系。朱棣1403年迁都北京后，太行山成为连接京师与中原的天然屏障，“山西”之名的方位属性进一步凸显其战略价值。

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和政治中心东迁，太行山的地理意义逐渐凸显：北宋定都开封后，太行山成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明清时期，北京成为政治中心，太行山进一步成为连接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关键节点。

现代山西的地理特征也强化了“山西”这一名称的合理性。山西全境被太行山、吕梁山夹峙，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2025年最新地理数据显示，山西东西宽约280公里，南北长约680公里，平均海拔1000米，是典型的山地高原地形。

“山围盆地”的地貌结构，使“山西”这一以山为界的命名比“河东”更具地理辨识度。此外，山西与河南、陕西接壤的黄河段仅占其西部边界的一小部分（主要集中在晋西南），以“河东”命名反而会模糊其主体性。

尽管“山西”成为官方名称，但“河东”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民间文化中，“河东”仍作为山西西南部